

演出完了以后我会把照片、感谢信寄到他们家里去。这是因为我把民乐队的日常工作当作事业来做，我是用心在做每一件事。做好“人”的工作，比调好“弦”更重要。队长首先要把自己的心交给乐队，才能带出一支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队伍，演奏的曲目才能感动听众，引起共鸣。

清华文艺社团营造出的文化像一个“场”，也像酒的酿造一样，在这个文化

环境中大家互相影响、相互熏陶，共同成长。文艺社团出来的人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即对事业的追求，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对人充满热情，对生活无限热爱。

感谢清华大学，感谢清华文艺社团，给了我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我后来出国十年，最后还是选择回到祖国，回到清华这个圈子里，既是为了报效祖国，也为母校发展尽了自己一份微薄之力。

## 90年代中文系读书时的人和事

○金兼斌（1986级工物）



金兼斌教授

2023年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建院30周年。回头来看，30年前清华大学成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标志着清华大学开始重建人文社会学科之路，实质性从一所工科大学向综合性大学转变，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但清华大学重建文科的探索和尝试，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

我是1986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高中时，我文理比较均衡，虽然以理科生参加高考，但对人文社科其实也很感兴趣。80年代的清华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工

科大学，不仅体现在学科设置上，也体现在校园风貌和校内各种规章制度和行事习惯背后的思维逻辑上。我并不很习惯这样的环境，加上周围学霸环伺，高中时借由各科平衡而确立的综合优势，来到清华后发现几乎每一科都有一堆好手排名在自己前面，专业的兴趣和认同感迟迟未能建立起来。每次进出工物馆，除了熟悉，却并无亲近感。毕业设计时，有一日熬夜在实验室分析数据，记得有那么一个瞬间，蓦然抬头，惨白的日光灯下，满眼是仪器设备对我冷冰冰地注视着。那一刻我生出一股绝望之情，坚定了今后要向人文社科方向进行转向的决心。

其实在大三时，我就听说当时以开设全校性人文选修课为主的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面向校内各理工学院系学生的科技编辑第二学士学位项目。我在正式申请这个项目前，已经选修或旁听了中文系不少老师的课程，包括徐葆耕老师的“西方文艺思潮”，丁夏老师的“中国古代小说”，杨

民老师的“中国古代诗歌散文”，以及来自北师大并随后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蓝棣之教授的“现当代诗歌赏析”等。正式开始编辑专业学习后，葛兆光老师、赵丽明老师、袁毓林老师和韩家鳌老师等名家都给我们上过课。几十年后，这些老师当年讲课时的神采飞扬，每每想起仍然会清晰地呈现在我脑海中，宛如昨日。

中文系的科技编辑专业是当时中央领导胡乔木等建议开设的，初衷是希望清华大学培养一批具有扎实理工科背景、面向科技报刊从事记者和编辑的复合型人才。清华大学从1985年开始招收校内不同理工专业的学生攻读科技编辑第二学士学位，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清华院系调整变成工科院校后第一次出现文科专业学生。那时清华的本科都是五年制，第二学士学位本身学制两年，学生在其第四、第五年需要上两个专业的课程。第一届招收的是1982级学生，是为编2班。几年后，科技编辑专业改为从学生第五年开始上课，并在原来五年学制基础上延长一年，即六年拿文理两个本科学位。我是1986年入学工物系的，进入中文系学习是1990年。1991年7月从材料系（1988年从工物系等专业分出建立）毕业后，我继续在中文系攻读科技编辑第二学位，1992年7月和1987级的同学一起毕业。记得1987级全校的毕业纪念册的篇首辞是请我写的。

我家里的书架上迄今仍保留着一本绿色封皮的、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缩印本，这是我在中文系学习的

第一年参加系里组织的纪念朱自清先生的一个征文活动获得的奖品。我1986年刚入校不久就赶上大礼堂西侧闻亭坡下的闻一多雕像的落成仪式，我还清晰地记得在二教聆听闻一多先生之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闻立鹏先生谈他对父亲的回忆和父亲对他一生的影响。朱自清和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期先后都担任过中文系主任，就文脉之延续而言，闻一多和朱自清对后世中文系、特别是对80年代中期刚刚复建的中文系有重要的意义。我记得1990年底中文系组织的那次纪念朱自清先生的征文活动的缘由之一，是1990年6月底朱自清先生的遗孀陈竹隐女士去世。据有关史料记载，陈竹隐女士生前把保存的朱自清先生的手稿、书籍和其他一些实物都捐给了清华大学，而陈竹隐女士长期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在我获得的奖品《辞海》扉页上，写着一句勉励的话：“金兼斌同学：向朱自清先生学习，塑造完美的人格。”落款是“中文系”，时间是1991年5月30日。我留中文系工作后有机会经常看到徐葆耕老师的手札笔迹，知道那句话那行字应该



编6班同学出游合影。左1刘俊君，左4起：文凤雏、陈涛、张碧涌、霍中心、金兼斌、王承红，右1陈斌

出自徐老师手笔。朱自清先生1935年9月至1936年9月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而我自2022年10月开始担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从中文系到图书馆，我觉得我的职业轨迹和朱先生冥冥之中竟有几分相似。

按现在的标准回头去看，草创时期的中文系，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难言完善，但却自有其特色，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走小而精、有特色的清华文科发展道路，力图培养文理交叉、中西贯通、古今融汇的复合型人才。当然，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真正通过大学教学造就如清华历史上那些学贯中西文理皆通的人物，其实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天时者，时代之特点和风尚，如所处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和状况、其时人对人对事的考核评价标准和价值观等；地利者，所处院系的教学培养软硬件配置，特别是师资配备和学术资源积累情况；人和者，学生自己的人文、科学素养和天资悟性。一个文理贯通的人才很难只通过上一些人文、理工类课程就可以完成和实现。拼盘式教学固然可能培养出一些有一定交叉学科素养的毕业生，但同样也可能产出在人文和理工两方面都不具优势的“四不像”学生。中文系科技编辑专业对文理贯通的尝试探索，前后大概有十年左右时间，至1994年以正式开始对外招收本科生为标志，逐渐向传统的语言文学这一主流回归，基于校内理工专业学生的第二学士学位基本结束。但这段办学历程，至少在科技编辑和计算语言学这两个文理交叉学科方向的探索，清华中文系在当时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体现了当时的清华校领导以及以徐葆耕、孙宝寅老师等为代表的

中文系领导对清华特色的文科发展之路的创新性思考，留下了一段值得去好好总结回顾的独特办学探索历程。

从1990年8月到1992年7月，我在中文系修读科技编辑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的过程，总体上是轻松而愉快的，当然这是相比我在清华前四年在工物系和材料系的学习经历而言。一方面这是文科和理工科学习压力的不同造成的，另一方面，我想也是因为其时我来到大学高年级，心态上也变得更加从容和放松，真正开始融入到清华简朴上进的独特氛围和环境之中。中文系的不少课也是我所喜欢的，比如徐葆耕老师开设的写作课。徐老师采用案例教学法，主要是带我们欣赏不同的文学作品，并鼓励我们按自己的兴趣和主题、类型写作，他来评价并提出修改意见。每次上课，徐老师都会津津有味地朗读一些同学们的习作。我们编6班同学中，文凤雏最有文采，习作多次被朗读和称赞。我记得凤雏有一次写了一篇名为《瓶塞》的小说，徐老师大加赞赏，这篇小说后来刊登在我作为主编的学生刊物《荷塘》上。我也是在徐老师的课上开始尝试写一些介于小说和记叙文之间的不伦不类的“作品”，但徐老师总会发现“作品”中的一些亮眼片段在班上阅读，使我对自己的文字越来越有信心。要知道在我大学几年中，我多次参加清华一年一度的全校作文大赛，每次都是榜上无名铩羽而归，令我对自己的文字能力产生严重怀疑。我记得比我低一级的编7班学弟、毕业后一直在图书馆信息技术部工作的张成昱，文采斐然，多次获得过这个全校性作文大赛的一等奖。多年后，我和成昱又成为图书馆的同事。成昱多年来保持着每周创作诗词的

习惯，出口成章，迄今作品逾千。世间万象，人生百态，皆可入题，娓娓道来，既合乎韵律又格调高远，颇有大家风范。每每对内对外有一些重要的活动，我都会邀请成昱赋诗作词，由我不揣冒昧进行书写，作为清华馆礼物题赠相送。

我们编6班一开始有十几个人，但1991年7月我们1986级毕业前夕，不少同学还是按原专业毕业了，没有选择继续攻读科技编辑专业第二学位，所以我们编6班1992年7月毕业时只有8个同学，其中2名女生，6名男生。那时清华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和往来，其中原因之一是当时香港浸会大学校长谢志伟博士的哥哥谢志成在清华工作，兄弟情深，带动了清华和浸会两校之间的诸多往来合作，这种合作的其中一个项目，是两校共建清华大学近春楼。由于在近春楼的建设过程中浸会大学是重要的出资方，根据协议，那时每年会有一些浸会大学的老师来北京调研，可以免费住在近春楼。



1993年，部分中文系老师和编7班同学毕业合影留念。  
中排左起：金兼斌、余顺吾、孙殷望、徐葆耕、张绪潭、孙传耀、姚金霄，后排左2起：张成昱、曹自学、孙宝寅

1992年毕业前夕那一学期，学院推荐文凤雏和我一起帮一位当时住在近春楼的浸会大学文学院的老师查找资料。当时电脑尚未普及，更不要说是上网。我和凤雏按浸会教授的要求，多次到国家图书馆帮教授查找和复印所需资料。项目结束，那位教授给凤雏和我一个装有港币的信封作为报酬。我们俩认为这是系里委派我们的工作，坚辞不收。过后没几天，徐老师在全系师生大会上特意说了这件事，对凤雏和我予以表扬，说那位香港教授为我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品性而深受触动。

那个时候，我们毕业之前学校和学院会请毕业学生在食堂聚餐，气氛热烈而伤感。而凤雏和我则有幸受徐老师邀请在毕业之前到他家里吃饭。徐老师当时住在照澜院一带的东区16号楼。其时一年多前，徐老师从原来的房子搬到东楼，还是我们一帮男生帮着搬的家具。徐老师太太高敦复老师也是人文学院的教授，烧得一手好菜，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晚的一盘红烧

鱼，几十年后似乎还回味无穷。凤雏和我都比较内向拘谨，那晚其实话不多，只顾闷头吃饭，倒是徐老师谈笑风生，不断勉励我们。其时凤雏已经确定要回湖南工作，去和她相恋五年的高中同学会合。记得为了落实凤雏在《湖南日报》社的工作岗位，系里多位领导老师通过各种途径向《湖南日报》社进行推荐。当时的系党总支书记孙殷望老师更是为此专程跑了一趟长沙，才最后落实。如今凤雏是湖南日报社编委。凤雏和碧涌是编6班中一直在新闻媒体工作的两位毕业生。



在我1992年中文系编辑专业毕业前，还发生了一件对我和我们编6班全体同学而言一生难忘的事：我们亲眼目睹了当时中文系主任张正权老师倒在去教室给我们上课的楼梯口，并最终不治离世。

我记得那是一个有阳光但寒风清凛的冬日上午，第二大节课是张正权老师给我们开设的，课名已经记不得了，上课地点在当时中文系所在的文北楼四层。我记得我和另外一名编6同学一起进入文北楼，在上楼梯时，见到前面张正权老师一手拎着手提包一手扶着楼梯扶手在慢慢往上走，我们也就放慢了脚步，和张老师隔着一两米远一起慢慢往上走。上到四楼，就在从楼梯进入教室和办公室的转弯区，我们忽然感觉到前面张正权老师停住了。待我们经过时，看到他一手扶着门一边在大口喘气，脸色铁青。我们吓了一跳，惊魂未定中，但见张老师就在我们面前像一团面条一样慢慢软倒在地上。中文系办公室就在楼下，我们立刻跑到下面办公室报告系里老师，楼里顿时陷入一片手忙脚乱。我记得校医院很快来了救护车，我们几个男生帮着把张老师抬到救护车上。我们几位男生一起随救护车到校医院。校医院很快就作出判断，表示校医院条件和能力无法抢救，建议即刻转院。于是我们又一起随救护车来到北医三院急诊室抢救。我们在旁边无能为力地目睹了整个抢救过程。医院和医生使用了包括电击在内的各种手段，但张老师始终再没醒过来。

张老师的夫人也是医生，等她赶到现场时，张老师的心跳在监视器上已经是一条直线，再无脉动迹象。有医生询问要不要切开胸腔进行最后的尝试，她摇头表示不用了，并在张老师的额头上深情地吻了

一下，轻轻把张老师因为此前抢救弄乱的头发用手梳理整齐。当我和同学怀着悲伤和沮丧的心情走出北医三院的急诊大楼，我记得阳光格外刺眼，我们都不敢相信张正权老师就此永远离开了我们。

几天后，我们中文系大部分师生在八宝山一个告别厅送别张正权老师。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画面是徐葆耕老师在进行遗体告别时泪流满面，对着张老师的遗体放声大哭。徐老师和张正权老师都是清华理工科毕业，张正权老师比徐老师年长，两人是先后留校分配到校宣传部和校报《新清华》同事多年，又一起合作作为正副系主任领导中文系的复建工作，张老师于徐老师既是同事、朋友，又是战友、兄长。这种对朝夕相处的同事战友骤然离去的不舍和心痛，在多年后的2010年早春，当我们同样在八宝山送别徐葆耕老师时，我无比真切地感同身受。

2021年冬天的一个周末，编6班同学刘俊君约我一起吃饭。席间他告诉我，他这些年合伙创办的一个教培公司前不久上市出售了，他实现了财务自由。毕业30年，他一直对当年张正权老师倒在讲台上的一幕不能忘怀，他希望能做点事来表达对张老师的怀念之情。我建议他如果可能，或可给张正权老师和徐葆耕老师各设立一个纪念基金。俊君爽快应允。由于徐葆耕教授还是1998年成立的新闻传播系的首任系主任，因此我建议徐葆耕纪念奖学金放在新闻与传播学院，张正权纪念奖则由人文学院中文系管理。

一个温暖的童年常常足以慰藉我们一生。在清华读书的那些青葱岁月，对我此后几十年的人生之路和职业生涯都具有非凡的意义。